

宣德年间应朱瞻基邀请到北京后驻锡大慈恩寺以及其他活动情况,考证了大慈法王参与助缘修建北京法海寺及主持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的茶毗法会等宗教活动,以及大慈法王圆寂的时间、地点等问题。王家鹏《论永乐宣德佛像艺术成就》分析了永宣时期佛像造像样式来源于汉藏两种文化的设计理念,阐述其精湛的成型工艺和传播影响。胡国强《明代初期宫廷造像分期》通过对北京故宫藏32件署有“大明永乐年施”的佛造像进行排比分析和科技检测,判定了永乐佛造像藏品的三个历史分期。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院庆85周年和明代紫禁城落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于2010年9月26日至12月26日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长久以来,故宫展览以清宫展览为特色,而此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首次将明代文物作为院内展览的重点。为配合此次展览,“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也随即召开,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两岸故宫每年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在大陆尚属首次,与会代表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博物馆界和明史界的专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形式,对于中国历史某段时期各方面问题的研究具有范例作用,因而深受两方面学界代表的欢迎。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 林欢)

“赣州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三十一届年会”综述

“赣州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三十一届年会”于2010年10月15—17日在江西赣州召开,会议由赣南师范学院承办。会议共提交论文九十余篇,分赣州及江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今介绍如下。

大多数学者以赣南及江西相关研究作为选题。首先,赣州城的历史和文化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韩振飞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简明阐述了赣州的发展历史。梁艳从古地名的分析讨论入手,揭示了宋城赣州浓郁的商业文化氛围。袁彦、常青以水与赣州及其人民的互动为核心,探讨了宋城赣州丰富的城市水文化。刘灯明从赣州通天岩铸钱摩崖石刻说起,认为宋代赣州铸钱业发达,在宋代铸钱业占有重要地位。张嗣介再现了明末清初赣州抗清史实,指出战争对人口和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清代早期闽粤客家人返迁或迁徙赣南移民潮出现的主因。杨恒平考察历代《赣州府志》纂修情况,并对现存旧志的因袭传承加以解读。窦秀艳认为明清以来流传的众多《埤雅》版本源于明初建文帝时期江西赣州府刻本,并述及明代赣州刊刻该书及其流变情况。郭天祥考订了赣州文化名人钟绍京的卒年,以及他在参与李隆基诛杀韦氏前后所任官职问题。李云彪对苏轼两度经过赣州的史实加以考述,并对其当时心境有所分析。温春香认为经过书写和流传,文化史视野下的郁孤台逐渐成为文人家国之思的符号,远迈于一般景观。王忠强认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通篇展现了作者忧国爱民

的赤子之心。

其次,赣南客家地区的特殊情况、历史文化以及近代中共革命和蒋经国主政赣南等活动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问题。周建新综述了客家地区的碑刻研究。孙顺霖比较了中原地区与赣南、粤东客家谚语的异同,认为此举对加深客家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杨昶从祖先记忆、语言、风俗习惯、称谓等方面加以讨论,认为赣南客家人与中原汉民族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赣南则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王铁通过对清代中期江西义宁陈氏、福建武平王氏、江西兴国张氏等三部族谱的研究分析,否定了客家人源于中原的传统说法,认可客家是宋元时期闽、赣一代畬族后裔的观点。罗勇以赣南西部典型的客家聚落区上犹县营前镇为例,探讨了新老客家之间的生存竞争与调和共处,认为既有矛盾斗争也有共同发展,姓氏斗争和宗族发展交织在一起。钟俊昆对清代《龙川县志·耆寿》记载的客家长寿女性的孝行等指标进行归类并作了SPSS统计分析,发现客家妇女的孝行比例并不高,与寿龄、家境显达没有特别联系,客家妇女的孝行与勤劳节俭、乐善好施等品质有关但关联性不大,但相夫教子、庄敬慈惠的客家妇女多有孝行。

邹春生考察了源于赣南民间进而影响到周边省区,逐渐为道教以及官方接受的“江东神”,认为这一客家地区的土著文化逆向传播于非客家地区的现象,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凌焰采用文献与田野结合的方法,认为贡江流域的赣州府是客家神祇赖公信仰比较集中的地域,神祇表现出猎人、雉神、官员等多种形象,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复杂一面。钟庆禄、陈丽娟论述了客家女红和客家服饰纹样,认为这些承载了客家的历史、风情并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美学价值。郭秋兰基于社会地域背景探讨宋代赣南盐子狱问题,认为宋代赣南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多元化,各种矛盾凸显,“盐”最终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盐子狱则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沈振辉认为溺信风水、崇尚械斗的民风是赣南文明开化程度不高的表现,和赣南古代教育科举的落后有着内在的关联。万幼楠采用实地考察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指出风水“形势派”(江西派)在赣南的形成以及赣南长期动乱而采取“兴文”“弭盗”是赣南盛行风水塔的主因。范春义认为今传郭璞《葬书》非郭璞所做,所谓杨筠松窃取朝廷宝典的前提并不存在,郭、杨风水所奉《葬书》成书于北宋中期以后,杨筠松的贡献在于对风水技术进行了整合。赵敏认为名列江西诗派的曾几,诗学江西,部分诗歌则突破了江西诗风,并启迪了陆游等中兴诗人,甚至影响到江湖诗人的诗歌创作。陆勇强辑出中华书局版明末清初江西宁都人魏禧《魏叔子文集》的一篇佚文《艾陵文钞序》。郭康松认为精心组织队伍、注重体例创新、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和经世意义是乾嘉时期赣南学者谢启昆在文献编纂方面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温显贵则探讨了谢启昆《小学考》的目录学、史料和语言文字学价值。李晓方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对象,发现随着地方士绅权利的扩张,地方志逐渐呈现出族谱化的特征。

朱钦胜就中央苏区的审计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王罗旺认为中央苏区在建立妇女组织,发挥妇女的主体地位,提高妇女组织的领导水平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借鉴意义。曾耀春认为1928年福建永定暴动是中共利用近代城乡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推动革命发展的生动例证,体现了中共和农民在关于革命选择上的不一致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胡晓会分析了1935年前的中共外交的特点。范兴昕探讨中央苏区的办报历程、优良传统与缺点。肖飞华认为闽粤赣边区客家民众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支持,是长征后该区三年游击战得以坚持到最后,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郭平兴以江西新余档案馆所藏《江西省禁书原始

文献》为中心,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在江西中央苏区禁书活动进行探讨。黄保华论述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革命宣传工作的特点。方世藻、王溶探讨蒋经国主政赣南时的个性心理活动对建设新赣南所取得成效的影响。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推行的教育改革引起了谢敏华关注,认为因其能够立足当地社会的实际状况,适应了客家教育传统的特点,改革成效显著,赣南教育事业一度繁荣。

会议涉及江西历史名人及文化研究的有以下内容。古永继分析探讨了江西移民入滇的类别、分布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董莉以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家族宗族为例,认为大力培养科举人才、建宗祠、修族谱、订族约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而这种内在的凝聚机制则是传统中国宗族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邓锐认为欧阳修继承了《春秋》笔法的史学求真理念,求义理之真表现在书义理评价、书道义责任和诤书三个方面,求史实之真则包括考证史事、“责备贤者”、“大恶而不隐”、重人事并反迷信四个方面。张全明分析朱熹对科举的态度由从众、怀疑、批评并进而提出较完善的改革主张后,认为明清时期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的科举考试及其引发的弊端,是与朱熹生前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杨新勋探析朱熹疑《诗》的种种表现后,指出其本质上是《诗经》学理论在新时代的调整,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关系密切。吕小琴考证了南宋饶州人汤汉的家世与生平,并就其为官、学术等方面加以述评。郭翠丽扼要论述了明代湛若水所开创的甘泉学派在江西的发展演化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和学术活动。任昉利用故宫博物院藏《铜陵观帖船歌》,对于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的献俘行迹及其当时处境加以考订。郝润华对李梦阳在为官江西期间被诬入狱与宁王朱宸濠之关系加以考证。蒲霞通过对《永乐大典》本《泰和志》两条引文的研究,指出应当有江西和安徽两部《泰和志》,订正了《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之失。吕锡生认为徐霞客江西游记补充和纠正了方志的不足,是一部明末自然和社会的宝贵考察实录。《广志绎》是王士性的地理名作,内容丰富,龚剑锋、孙光辉选取其卷四《江南诸省·江右》,述其所载有关江西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内容。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会议讨论的另一主题。有学者就文献学理论加以探索。陈东辉《试论古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关系》认为打通古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大文献学”提法有一定道理,但具体操作行不通。唐光荣认为西方古典学界以连结性、区分性讹误为基础确立版本谱系图的方法,对于中国历史文献的版本分析和校勘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曹书杰、杨栋认为“传统考据学”是相对于王国维之后的“现代考据学”而言,并就传统考据学的定义及传统考据的特征、类型、形态和考证的目的、意义一一展开讨论。王记录从校勘目的、校勘原则、校勘家修养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吴建伟认为由于对石刻文献的重视,使陈垣在宗教史及其他史学研究方面取得显著乃至开拓性的成就。

文献研究是与会学者提交论文另一个较为集中的方面。David B. Honey 着重介绍了其即将出版的《西方经学史概论》一书的结构及主要学术成就。敖堃从诗的“内证”角度探讨《诗经·豳风》之《七月》中的历法。庞天佑对比了周秦诸子对于历史的认识与儒家经典对于历史的总结。王化平认为《孔子家语》在整理过程中主观改动性更多,从而使其价值不太可能高于《礼记》等书。赵生群对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史记》之《五帝本纪》提出了22处质疑。周怀宇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梳理了秦始皇的政治思想及其来源。孙振田认为《汉书·艺

文志·诗赋略》的杂赋类即整个赋类的杂编,符合《汉志》著“杂”于末的体例特点,对其加以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本体因素。杜朝晖利用敦煌文献,分析认为《后汉书》中所记载的两汉时期民间普遍使用的独轮车“鹿车”的称名源于“羸车”一词。刘立志就岳麓书社本《谢灵运集》与台北里仁书局本《谢灵运集校注》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讨论订正。许琰从《西昆酬唱集》的题材、艺术特点以及传承与影响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了该书在唐诗向宋诗转型过程中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吕友仁辨正历代注家对苏轼、黄庭坚诗中“吏隐”典故的误读后,肯定了辑本《汝南先贤传》的学术价值。唐明贵认为程颢出于攘斥佛老的目的在解释《论语》时将理学元素大量注入其中,使程注《论语》在《论语》学史乃至中国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程语录比较全面地记录了程颢、程颐理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过程,在洛学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赵振认为正是随着宋人对二程语录的编辑和传布,洛学也在宋代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和进一步发展,最终在南宋末成为官方哲学。徐公喜、宋效永认为宋明理学“四书”学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道统相对应,实现对道统的体认,为了充分挖掘“四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使道统解释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最终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张保见认为《宝庆四明志》为浙江宁波地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备的成型志书,编撰体例较有特色,文献价值较大。王晓鹃通过对其他文献的逐一比勘稽核,考定南宋王厚之编撰的《古文苑》所辑录诗文有四成以上并非来自唐宋类书,从而订正了四库馆臣之误。李雄飞探讨了《儒门事亲》一书的成书及流传,指出首都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有较高的版本价值。诸伟奇对曾经眼的明末清初黄珀的十部著述流传版本情况加以逐一考察。吴海兰认为清初修《明史》时经激烈反对最终废除《理学传》,所带来的结果是王阳明及其王学最终被否定。刘蔷辑录旧闻,再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善本藏书“天禄琳琅”前编书之风貌,认定其毁于嘉庆二年乾清宫大火,并讨论了其劫余与“目外书”问题。柳燕考察《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文献著录情况后,逐一分析了梁、唐、宋、元、明、清该类文献的收录特点。陈晓华在分析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认为《四库全书》和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纂修均受到对方文化的影响,存在大的文化关照下的互动关系。王丽芸考察文献,就《清史稿·地理志》“冲繁疲难”加以解释,同时质疑《汉语大词典》的相关词条。蔡慧认为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是一部通古今之变、写九州方圆的佳作。

基于文献分析基础上的相关人物研究也是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赵捷认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间的和谐亲情关系对于他们在政治生活、文学成就、社会活动等方面影响较大。杨亮以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为中心探讨馆阁体文学,指出其形成和发展及其艺术特点与翰林国史院文士的倡导有密切关系。俞正燮在乾嘉时期的女性研究及其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引起了余敏辉的关注。孙雅芬认为桂馥以“六经为本,由小学以通经”为治学思想,其诗文创作以六经为根柢,考据入诗,以学问为诗,彰显诗文尚实的特质。杨全顺认为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由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以今文为工具议政,具有近代鲜明的思想意识;因将学术重心由经学转向史地之学,不立门户,反对荒诞迷信而具有近代科学色彩。董恩林综合考查《皇清经解》正续编后,认为清经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霍明琨以罗尔刚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和金毓黻的东北史研究为考查主线,探讨并比较二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地域情感和学术视角之异同。

此外,贾贵荣、耿素丽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关人物历史文献的出版规模、内容、时代和

范围等,为相关人物研究提供了检索的便利。赖玉芹爬梳黄州方志、文集、家谱等地方文献,通过对明清时期黄州士绅保护和发展地方文化方面事迹的勾勒,认为士绅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感。洪认清回顾延安时期革命学人的中国史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古史分期、原始社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创新性成就,影响深远。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保见)

近 10 年来韩国的中国先秦、秦汉史研究综述

(韩)具隆会

(安阳师范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2)

一 对中国先秦、秦汉史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特点

自 2000 年以后,在韩国对先秦、秦汉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加。从数量上看:自 2000 年到 2001 年,发表的论文约有 20 多篇(《〈东洋史〉回顾与展望》,《历史学报》第 175 辑);2002 年到 2003 年,发表的论文约有 30 余篇(《〈东洋史〉回顾与展望》,《历史学报》第 183 辑);2004 年到 2005 年,有关研究成果大幅增加,发表的论文约有 50 多篇(《〈东洋史〉回顾与展望》,《历史学报》第 191 辑);2006 年到 2007 年特征为随着在中国新出土考古资料的增加,在韩国的学术界成立了金文研究小组、简牍研究小组、礼制史研究小组等,并能够利用 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的信息,解决了中国出版资料收集的问题。这时期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约有 70 余篇(《〈东洋史〉回顾与展望》,《历史学报》第 199 辑)。近 10 年来有 9 篇先秦、秦汉史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其题目如下:其一,权赫允《汉代官吏等用制度与尚书的关系研究》(韩国高丽大学校,2004 年);其二,闵厚基《在古代中国爵制的形成与展开——从殷商到战国》(韩国延世大学校,2004 年);其三,文贞喜《秦汉祭礼与国家支配》(韩国延世大学校,2005 年);其四,金容天《前汉时代典礼论研究》(韩国东国大学校,2005 年);其五,金东民《汉代春秋公羊学的成立和展开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校,2006 年);其六,郑勉《古代云南“서찬국”研究》(韩国西江大学校,2006 年);其七,金珍佑《中国古代‘孝’思想的展开和国家权力》(韩国高丽大学校,2007 年);其八,番采英《从尹湾汉墓简牍来看汉代地方统治》(韩国忠北大学校,2007 年);其九,李晟远《古代中国之乐的统一性研究》(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校,2007 年)。此外,研究的范围也更广泛:首先,以传说和咒术及术数和《易学》为主,对古代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如对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其次,对简牍资料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张家山汉简进行研究,法制和一般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三,对地域历史和文化系统及地方支配方式进行探索,对国家礼仪的思想性及其本质进行研